

# 目录

总序 .....	王克非	ix
前言 .....	赵秋荣 葛晓华	xiv

## 第一章 翻译能力研究概述 1

---

1.1 翻译能力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	1
1.1.1 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 .....	2
1.1.2 翻译能力与翻译方向 .....	3
1.1.3 笔译能力与口译能力 .....	6
1.2 国外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研究 .....	7
1.2.1 翻译能力研究发轫期 .....	8
1.2.2 翻译能力研究强化期 .....	11
1.3 国内关于翻译能力研究的探讨 .....	18
1.4 翻译能力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	20
1.5 小结 .....	23

## 第二章 翻译能力发展研究 25

---

2.1 翻译能力的不同发展阶段 .....	25
2.2 翻译能力发展：理论研究 .....	26
2.2.1 国外关于翻译能力发展的理论研究 .....	26
2.2.2 国内关于翻译能力发展的理论研究 .....	28
2.3 翻译能力发展：实证研究 .....	29

2.3.1	国外关于翻译能力发展的实验 .....	29
2.3.2	国内关于翻译能力发展的实验 .....	40
2.4	小结 .....	44
<b>第三章 翻译技术能力</b>		<b>46</b>
<hr/>		
3.1	翻译技术能力与译者互动研究 .....	47
3.2	翻译技术能力构成研究 .....	49
3.3	翻译教学与译者培训中的翻译技术工具 .....	55
3.3.1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	56
3.3.2	机器翻译工具 .....	59
3.4	翻译技术能力培养中的问题与困境 .....	61
3.5	小结 .....	63
<b>第四章 翻译修改能力</b>		<b>64</b>
<hr/>		
4.1	翻译修改及其能力概述 .....	64
4.2	翻译修改及其能力研究 .....	66
4.3	翻译修改个案研究 .....	70
4.3.1	案例一：翻译家傅东华自我修改研究 .....	71
4.3.2	案例二：翻译家葛浩文自我修改研究 .....	79
4.3.3	案例三：翻译家张爱玲与孔慧怡的合作修改研究 .....	88
4.4	翻译修改能力模型探索 .....	99
4.5	翻译修改能力培养 .....	106
4.6	小结 .....	107

<b>第五章 译后编辑能力</b>	109
5.1 编辑与译后编辑的区别与联系	111
5.2 译后编辑及其能力研究	113
5.3 译后编辑能力模型探索	116
5.4 译后编辑能力培养	123
5.5 小结	126
<b>第六章 翻译能力评估</b>	128
6.1 翻译能力评估的类型	129
6.2 翻译能力评估的理论	131
6.2.1 国外翻译能力评估的文献分布情况	132
6.2.2 国内翻译能力评估的文献分布情况	136
6.3 翻译能力评估的方法	139
6.3.1 翻译能力评估方法概述	139
6.3.2 八种具体翻译能力评估途径	141
6.4 翻译能力评估的实践	145
6.4.1 Hurtado Albir & Pavani (2018) 的翻译教学评估	147
6.4.2 Huertas-Barros <i>et al.</i> (2019) 的口笔译 质量保证和评估实践	147
6.4.3 葛晓华 (2021) 在翻译教学领域的评估实践	150
6.5 小结	153
<b>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b>	154
7.1 翻译能力研究的主要贡献	154

7.2 翻译能力研究目前的困境.....	155
7.3 翻译能力研究的发展趋势.....	157
<b>参考文献</b>	159
<b>推荐文献</b>	189
<b>索引</b>	191

# 前言<sup>1</sup>

翻译是古老的跨语言交际活动，涉及复杂的心智过程，其能力不易界定、识别，更难量化。因此，研究者多通过考察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来分析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萌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开始探索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Wilss 1982)。经过西班牙“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简称PACTE)研究小组、奥地利TransComp研究小组以及“欧盟翻译硕士项目”(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 简称EMT)专家团队等的进一步探索，翻译能力研究如今已成为翻译学领域尤其是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核心话题。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翻译行业、语言服务业的布局以及译者的工作环境，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语料库、机器翻译等成为译者必备的翻译工具。翻译能力研究不断借鉴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最新成果，探索翻译作为语言转换过程、交际过程以及决策过程等方面的特征与规律，相关成果广泛应用于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中。可以说，翻译能力研究已成为真正连接翻译学理论、翻译

---

1 本书为北京科技大学2019年度青年教学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2302019JXGGRC-003)、2021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22JGC016)和2022年度科技与文明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开放课题(2022KFZD001)的部分成果。

教学和译者培训的重要纽带，也为翻译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翻译能力研究的前沿团队PACTE研究小组和EMT专家团队根据研究进展、技术工具发展和市场需求，不断修订已有翻译能力框架，使人们不断拓展和深化对翻译能力的认知。显然，翻译能力研究已离不开对现代翻译技术能力、修改能力、机器翻译能力等新能力要素的讨论，相较于三四十年前其内涵和外延已有很大拓展。

在翻译能力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如下问题：除了双语能力外，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能力还包括哪些能力、技巧和素质？大数据时代对译者翻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能力，译者还应具备哪些新的翻译能力？如何评估翻译能力？等等。

基于此，本书围绕国内外翻译能力研究进展、大数据时代必备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评估等三部分内容共七章展开。第一、二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关注国内外翻译能力研究的进展；第三、四、五章为第二部分，重点讨论大数据时代必备的翻译能力；第六、七章为第三部分，考察翻译能力评估的研究现状与进展，总结和展望翻译能力研究。具体分述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翻译能力的定义、构成要素和研究方法，重点介绍PACTE翻译能力模型、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和EMT翻译能力框架，以及它们的发展与优化。第二章概述翻译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围绕翻译能力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三章介绍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和机器翻译工具等在翻译能力培养中的作用。第四章讨论翻译修改能力，从译入和译出两个方向介绍著名翻译家的自我修改与他者修改。本章提出，借鉴翻译家的修改经验，有助于培养译者的修改能力。此外，本章也探讨了国外翻译修改能力模型。第五章介绍国内外译后编辑能力研究，探讨了译后编辑能力模型及译后编辑能力的培养。由于机器翻译技术尚未成熟，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译后编辑将成为机器翻译的有效补充。第六章介绍翻译能力评估的类型、理论、方法和实践。第七章总结翻译能力研究的主要贡献、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翻译能力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目前翻译能力研究的局限性。现有的翻译能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静态的而非动态变化的 (Piotrowska 2015: 20)。此外，基于实验室的翻译过程研究涉及的被试、语料、文体类型等往往比较有限，因此无法完全模拟真实状态下的口笔译活动，也不能完全概括翻译能力研究的全貌。未来基于翻译能力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Hurtado Albir 2021: 389)。

北京科技大学赵秋荣博士的学术专长为语料库翻译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她负责前言、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七章的撰写，以及全书统稿工作。中国人民大学葛晓华博士的学术专长为翻译能力和翻译评测研究，她负责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的内容。书稿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我们的导师王克非教授。蒙老师知遇之恩，我们得以进入语料库翻译学及翻译能力研究领域，并在其指引下不断了解学术前沿，拓展研究方向。学术研究道路上一路走来，感谢诸多前辈、师长和朋友的鼓励与帮助；感谢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感谢博士生、硕士生们与我们一道不断尝试新工具、新方法。辛苦，但乐趣无穷。感谢外研社都帮森老师和王丛琪老师带领的编辑团队，他们严谨、认真的编校工作使书稿不断完善，个人受益颇多。最后特别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受个人水平限制，书中难免还有诸多不足或需要继续探讨商榷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朋友们多多批评，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督促我们进一步提高！

赵秋荣 葛晓华

2022年5月

# 翻译能力研究概述

翻译历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翻译人才培养的核心之一是培养译者的翻译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由哪些部分组成，如何培养翻译能力，如何评估翻译能力等。本章主要概述翻译能力及相关概念、国内外翻译能力发展的前沿研究等。

## 1.1 翻译能力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能力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通常指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本领及个性心理特征，可分为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一般能力是完成大多数活动需要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注意力等；特殊能力则是完成某项活动需要的能力，如绘画能力、音乐能力等。翻译能力不易识别，更难定义，从它的多个名称可见一斑，如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Nord 1988: 160)、翻译表现(translation performance)(Lörscher 1991)、翻译能力(translational competence)(Chesterman 1997: 147; Hansen 1997: 205; Toury 1995: 250)、译者能力(translator's competence)(Király 1995: 108)、翻译专长(translation expertise)(Shreve



2006)等。国内翻译学领域基本采用了上述对应的汉语表达。可能受“应用语言学语言能力”这一概念的影响,“翻译能力”这一术语在学界使用较为普遍。《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将翻译能力定义为: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时使用的所有语言资源(Shuttleworth & Cowie 2014: 26)。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一般的翻译能力,即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呈现的翻译能力,不包括近来谈论较多的国家翻译能力。因此,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书将翻译能力定义为:为完成翻译任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调用的所有知识、技能和素养。

### 1.1.1 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

翻译能力研究初期,很多学者持“自然译者观”,即认为只要懂双语,就能进行翻译。Harris & Sherwood(1978)基于双语儿童行为研究,提出双语能力与翻译能力共存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双语者,只要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便可成为译者。他们还指出,翻译能力具有天赋性、自发性和阶段性。翻译能力发展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字词翻译为主的前翻译阶段;第二阶段是自动翻译阶段,即将一种语言自动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第三阶段是通导(transduction)阶段,即作为交流媒介实现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然而,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人类认知活动,具有社会性。除了具备双语能力外,译者还需要掌握其他方面的能力,如此才能顺利完成翻译任务。所以说,双语能力尽管重要,但不等同于翻译能力。

Presas(2000)区别了翻译能力和双语能力,并指出翻译能力是译本产生过程中独有的。Hatim & Mason(1997: 205)提出翻译能力包括组织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基于Bachman(1990)的交际能力,Cao(1996)区分了翻译能力和翻译行为,并明确指出,不是所有具有双语能力、从事翻译行为的人都拥有翻译能力。她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翻译能力:翻译语言能力、翻译知识结构能力和翻译策略能力。此外,译者还需要具

备专业领域知识、情景翻译能力、管理和组织能力、翻译决策能力和与专家合作的能力等。上述能力在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中需要特别注意。

Toury (1986) 认为, 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既不同, 也不同步发展, 但合格的译者首先需要具备良好的双语能力, 即天生的翻译素质 (innate predisposition for translating)。翻译是社会交际行为, 翻译规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支配作用。习得翻译能力的过程也是译者建立翻译规范的过程 (Toury 2012: 289)。从双语者到合格译者不仅需要先天的语言能力, 还应具备后天形成的其他能力。该观点有力反驳了拥有双语能力即拥有翻译能力的观点。Toury (2012: 285-289) 进一步提出, 以双语者为代表的母语译者的能力培养需要经历两个阶段: 首先是外部反馈, 该反馈反映了译者所适用的社会语境规范; 其次是外部潜在反应, 这个过程是译者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只有双语者的翻译行为符合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规范, 他们才能成为合格的译者。该论述将翻译能力研究的范畴从语言层面拓展到文化层面。

综上所述, 双语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双语能力, 翻译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 但要顺利完成翻译任务, 译者除了具备良好的双语能力外, 还需要具备其他能力。只有双语能力与语言外各种能力共同作用, 译者才能有效完成翻译任务, 成为合格的译者。

### 1.1.2 翻译能力与翻译方向

翻译方向是西方翻译学界最古老的课题之一 (Gile 2005), 也是极易引起争议的研究课题 (Godijns & Hinderdael 2005)。翻译方向指意义传递方向, 即译者将母语 (或第一语言) 译为外语 (或第二语言), 或是将外语 (或第二语言) 译为母语 (或第一语言) (Beeby 2000; Pokorn 2011: 37)。译入母语的翻译行为常被称为“服务翻译” (Newmark 1988: 3)、“L1 翻译”、“正向翻译” (Beeby 1996)、“直接翻译” (张春柏 2003)、“译入翻译”等; 译入外语的翻译行为则常被称为“L2 翻译” (Stewart 1999)、“反向翻

译”、“间接翻译”、“译出翻译”等。

学界通常认为译入母语的翻译更准确、地道 (Baker 1992; Newmark 1988: 3; Nida 1975), 更能保证译作质量 (Dollerup 2000: 63)。译入过程中, 译者能够直接激活母语中的概念图示, 更符合认知机制 (Marmaridou 1996: 60-61)。翻译过程研究发现, 在译入与译出不同方向下, 译者存在认知层面的差异。当然, 这是另一个课题, 有待基于不同语言对、不同文本类型、不同类别的译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建议: “译者尽可能地将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或者掌握程度如母语般的语言” (Picken 1989: 245)。此外, 译入这一翻译现象历史更悠久。“一部两千年的中西翻译史就是一部译入史。西方翻译史, 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迄至20世纪初, 其翻译活动主要也是以译入活动为主: 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把希腊文化译介给自己民族; ……即使在18、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 欧洲各国的翻译活动基本上也是以译入活动为主” (谢天振 2017: 8)。译入活动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发展甚至国家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影响。翻译是民族、国家发展进步之需推动起来的; 另一方面, 翻译带来的文明互鉴和交流又转而推动了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王克非 1997: 276)。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翻译《圣经》, 奠定了现代德语的基础; 雅克·阿米欧 (Jacques Amyot) 借助翻译丰富了法语的发展; 无论是俄罗斯彼得大帝时代, 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翻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译入”也给语言文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改革开放时期的翻译活动等, 对于“丰富民族的文化, 开拓视野, 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王克非 1992: 8)。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就在一次次基于翻译和重译的文化传承中实现 (孔慧怡 2000: 3)。

对译出的质疑集中在翻译质量如语言的地道性上。Campbell (1998) 等学者表达了对译出翻译的担忧: 译者是否具有产出地道目标语言的能

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出翻译活动及其相关研究。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外市场对译出翻译需求的日益增加,参与译出翻译的译者数量也逐年增长。此外,如果一国语言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有限,也只能由本国译者进行译出(Hansen *et al.* 1998: 59-60; McAlester 1992: 292)。根据国际翻译家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简称FIT)的调查,772位受访者中一半以上的译者在从事译入翻译的同时也从事译出翻译(IAPTI 2015: 13)。目前,我国翻译市场特别重视译出翻译。黄友义(2015: 5)认为,“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量首次超过了外译中。这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变成了输出型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文化走出去,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黄友义(2017: 2)进一步指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懂中文的外国翻译家数量非常有限,没有足够的外国译者帮助我们从事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和介绍。因此,我国译者主动承担起了对外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

译入译出的翻译质量也备受重视。译入译出只是翻译方向上的概念,译入翻译并不能保证翻译产品具有较高质量(Bajo *et al.* 2000; Kim 2013: 107);仅仅根据翻译方向这一个因素,就断定译出翻译的产品质量低于译入翻译的产品质量,无疑是“民族优越感”的论断(Pokorn 2005: 37)。Pokorn(2005)基于斯洛文尼亚语-英语文学翻译语料库,比较了三组译者的翻译表现。研究发现,斯洛文尼亚语母语译者没有表现出搭配能力差或短语表达能力差的情况,但有时却不能完全理解源语。接着,Pokorn(2005)对46名英语本族语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者不能完全确定哪些译文是由母语译者翻译的,哪些是由非母语译者翻译的。该研究不能证实译出翻译质量比译入翻译质量差的观点。

综上所述,译者既可以承担译入翻译任务,也可以胜任译出翻译任务;译入译出翻译同等重要;翻译方向不能决定翻译能力。

### 1.1.3 笔译能力与口译能力

口译和笔译同属翻译学科，或者说是“翻译研究的姊妹学科”（sister discipline）（Shlesinger 1998）。二者有很多相似性，都是把一种语言里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sup>1</sup>。

口笔译翻译过程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差异也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认知加工程序、信息传递模式、质量考核和评估等方面（Gile 2009）。笔译多与语言学、比较文学、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紧密结合；而口译则更关注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视角（Defrancq *et al.* 2021: 1; Padilla & Martin 1992; 马会娟 2013）。此外，口笔译的差异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过程不同。笔译的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一般不直接接触，译者有足够时间阅读、理解、思考、查找资料、向他人请教，进而仔细推敲并组织语言。在查找资料环节，译者可借助术语库、语料库、平行文本等提升译文质量。笔译过程通常为：译前准备—翻译—自我修改—他者修改—审校—编辑排版—出版/发稿—反馈和总结。而口译过程中译者多直接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接触，译者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充分捕捉和理解说话者的语言信息、交际双方反馈等信息，同时将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口译人员需要实时观察说话者的表情、动作等细节，边听边理解边翻译，没有充分时间对译文进行字斟句酌，也不能使用工具书或语料库等。

第二，文本特征及受众对文本的期待不同。笔译涉及源语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三方，他们通常不会同时同地出现。笔译重视译文与原文信息、形式等方面的对等，遣词、造句、成篇等更趋于精雕细琢。读者期待译文自然、流畅、地道。口译通常也涉及三方：说者、译者和听者，三方一般同时同地出现。受即时性等特点影响，口译中译者几乎没有时间重新

---

1 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本书中提到的翻译通常指笔译。

组织源语语序。与笔译相比，口译译文的遣词造句、语段的连贯性等多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三，翻译效果的反馈方式不同。笔译中，审校人员、客户、受众或读者的反馈等都层层反馈给译者，译者可反复修改，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口译则直接面对客户或听众。客户或听众当时或事后向译者反馈口译效果，译者根据反馈查漏补缺、作出改进，但改进只能在下一次口译活动中体现。

口笔译的诸多差异以及对二者认识的不同，可能导致口笔译教学模式和译者培训的差异。目前通用的模式有：口笔译同时进行；口笔译各为核心课程，但分开培养；先训练笔译，再培训口译；研究生层次上进行口笔译分离教学与培训等（Padilla & Martin 1992；马会娟 2013）。口笔译翻译方式具有相通性和共融性，还可以积极探索口笔译融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张威、王克非 2015）。

充分认识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翻译能力与翻译方向、口笔译的差异，厘清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与相互关系，对于确定翻译教学与译者培训的内容、培养译者翻译能力等都有重要意义。

## 1.2 国外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研究

翻译能力研究萌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拓展，21世纪逐渐发展壮大并进入实证研究阶段。最近阶段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翻译能力研究的特点：除了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持续性探讨外，翻译技术能力、翻译修改能力、译后编辑能力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Hurtado Albir (2021) 在《劳特里奇翻译与认知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中以2000年为界限，将翻译能力研究划分为发轫期（2000年以前）和强化期（2000年以后）。本章以Hurtado Albir

(2021)提出的翻译能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为脉络,综述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而其他新兴翻译能力如翻译技术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中专门探讨。

### 1.2.1 翻译能力研究发初期

在这一时期,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散见于学者的论述中。Hymes (1971)认为翻译是交际行为,译者需要具备源语语言能力、目标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过程是译者综合运用各种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过程。Wilss (1976)认为翻译能力包括三个部分:源语接受能力、目标语再现能力和超能力(super-competence)。源语接受能力是解码和理解源语的能力;目标语再现能力指在目标语中使用语言和语篇资源的能力;超能力指在源语和目标语语言文化和篇章系统之间转换信息的能力。Nord (1991)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转换能力、语言学能力和文化能力。Pym (1991)提出翻译能力最简方案(minimalism),强调译者需要掌握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将同一源文本生成多种目标文本的能力;二是从系列目标文本中快速且有理有据地挑选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译本的能力。Nord (1992: 47)将翻译能力进一步细化为接受能力、篇章分析能力、研究能力、转换能力、文本产出能力、翻译质量评估能力,以及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能力。她认为翻译能力的培养目标是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产出满足“忠实和忠诚”标准的译文。Neubert (1994: 412)将翻译能力定义为译者应对翻译过程中易于变化的任务的能力,具体包括语言能力、主题能力和转化能力。评估翻译能力的参数涵盖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其中转换能力可以将翻译能力与其他能力区别开来。

Kiraly (1995: 108)进一步指出,有关译者能力的探讨拓展了翻译能力研究的范围。译者能力模型强调译者需要具备权衡翻译情景的能力;掌握与翻译相关的知识,如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学知识、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具备构建目标语文本的能力等。

此阶段表现突出的团队是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PACTE研究小组，该团队成立于1997年，于1998年提出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3)。他们认为翻译是复杂的交际活动，涉及翻译过程中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专长知识(PACTE 2003: 44)。针对以往翻译能力研究中的不足，如策略能力、心理-生理能力研究不充分，不同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较少，翻译能力习得过程模型讨论欠缺，尤其缺少实证研究等问题，PACTE团队提出了第一个相对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3: 47)。该研究为基于六个不同语言对的笔译实证研究，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德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等。研究被试有两组：一组是有五年及以上从业经验的职业译者；一组是没有职业翻译经验的语言教师。研究采用PROXY录屏、问卷调查、直接观察、回顾式有声思维等三角验证法(triangulation)<sup>1</sup>，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能力模型和动态翻译能力习得模型。所谓动态，是与翻译的静态概念相对，即将翻译看作一个集合语篇、解释、交际和功能的概念(Hurtado Albir 2017: 4)。

PACTE团队认为，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不同。双语能力只是翻译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能力还体现在专长知识上，包括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后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陈述性知识指知道关于“什么”(knowing what)的知识，该知识较容易表述，如知道哪些网页对译者有帮助；程序性知识指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的知识，该知识较难表述，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使用，如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经济性，知道如何使用网页(PACTE 2003: 45)。该研究认为，两组被试的陈述性知识有一定

1 三角验证法来源于测绘学，指航海中根据几个标记好的地点定位轮船的具体方位。这种方法推广到翻译研究中，指研究者综合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



差异，职业译者具有更强的动态翻译观，而外语教师的静态翻译观更强 (Hurtado Albir 2017: 283)。

PACTE初期翻译能力模型由六个互相联系、有层级关系的子能力构成(见图1.1)，包括双语交际能力、语言外能力、职业工具能力、心理-生理能力、转换能力和策略能力。转换能力位于翻译能力的核心；策略能力则位于最重要的位置，因为翻译过程中发现问题、作出决定、弥补其他子能力不足等都需要调用策略子能力。这些子能力在翻译能力模型中的重要性并非一成不变，如译出翻译过程中工具能力发挥的作用更大 (PACTE 2003: 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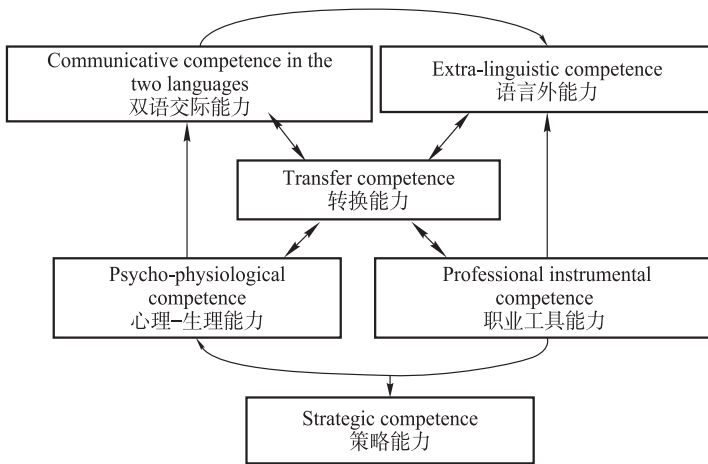


图 1.1 PACTE 初期翻译能力模型 (PACTE 2000: 101)

翻译能力培养的目标是将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新手培养成具有较高翻译能力的专家。翻译能力习得是重构且获得各翻译子能力的过程。受翻译方向、语言对、文体以及领域知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各子能力一直处于动态、螺旋式发展中。各子能力之间的发展虽不平衡，但有一定层级关系且

相互联系。在习得翻译的过程中，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相互交融，不断发展和重构。习得程序性知识、获得策略子能力的过程对于培养翻译能力尤为重要 (PACTE 2003: 49-50)。

学界关注翻译能力各个要素，如双语能力、语言外知识、文档能力和工具能力等，其中转换能力最受关注。此阶段翻译能力模型的雏形基本形成，尤以PACTE团队初期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最受关注。该阶段的不足之处是翻译能力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缺乏 (Hurtado Albir 2021: 395)。

### 1.2.2 翻译能力研究强化期

在这一时期，多位学者重新思考且优化了早期的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研究；实证翻译研究逐步加强，出现了相对成熟的翻译能力模型；一些专门讨论翻译能力的重要著作或论文集相继出版，如Schäffner & Adab (2000) 的《培养翻译能力》(*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Schwieter & Ferreira (2014) 的《翻译能力发展：来自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Psycho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Science*)、Hurtado Albir (2017) 的《基于PACTE团队的翻译能力研究》(*Research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y PACTE Group*)等。

Neubert (2000) 指出，翻译能力除了复杂性 (complexity)、异质性 (heterogeneity) 外，还有近似性 (approximation)、开放性 (open-endedness)、创造性 (creativity)、情景性 (situationality) 及历史性 (historicity) 等特点。这些翻译能力的特质或构成要素贯穿翻译过程始终，反映了译者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认知机制和能力构成。基于翻译和语言学习的关系、译者培训过程中理论的重要性、翻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等，安东尼·皮姆 (Anthony Pym) 提出了翻译能力最简方案。他认为信息化时代重新回顾最简方案非常有必要。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能够产出多种可行的译文并快速选择唯一契合的译文这一点仍未改变 (Pym

2003: 491)。他认为电子工具(如网络引擎)只是加速产出更多可选目标语文本的手段,或是支持去掉可选项的辅助。新技术没有改变这些任务的要求。本部分将重点介绍优化的PACTE翻译能力模型、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初始和优化的EMT翻译能力框架。

### 1.2.2.1 优化的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

PACTE研究小组在1998年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借助相关翻译知识问卷、动态翻译知识指数(dynamic index of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翻译知识一致性指数(coherence coefficient of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等,调研了识别、解决翻译问题和作出翻译决策的方法。随着实证研究进展和新技术发展,该团队不断修正翻译能力模型,于2003年提出优化模型。该模型优化了翻译能力的定义、前期模型中翻译能力各子能力间的作用等(PACTE 2003)。

翻译能力涉及从理解源语到产出目标语整个翻译过程所需的基本知识系统(PACTE 2003: 57-58)。优化模型包括五个子能力(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和翻译知识子能力),它们通过激活系列心理-生理要素起作用(PACTE 2003: 58)(见图1.2)。优化模型的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方面。(1)模型去掉了转换能力。转换能力不能区分双语者和职业译者。职业译者拥有转换能力,但是其专长在于将各种翻译子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转换能力不应是翻译能力的核心。(2)模型将策略能力看作核心翻译能力。策略能力在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激活、监控其他翻译子能力,对其不足进行控制和弥补,促进翻译能力之间相互作用,因此广泛应用于规划翻译项目、识别翻译错误、应用翻译策略、评估翻译过程等任务中。(3)模型将翻译知识能力作为独立的翻译子能力之一,而在初始模型中,它属于语言外能力和职业工具能力。(4)模型将心理-生理能力修改为心理-生理要素。该方面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形成专家知识。此外,模型还有一些细微变化,包括表达更为精炼准

确等，比如使用子能力代替初始模型中的能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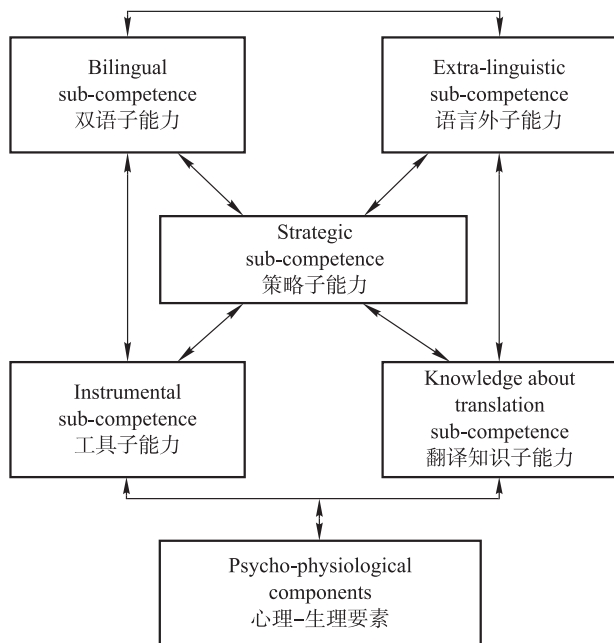


图 1.2 优化的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 (PACTE 2003: 60)

经过优化的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整合、重组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更重视程序性知识。该模型不仅较直观地勾勒出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也呈现了具体的、可执行的翻译子能力。基于各具体翻译子能力设置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模块，操作性会更强。

### 1.2.2.2 TransComp 翻译能力模型

2007年12月，受奥地利科学基金会支持，格拉茨大学苏珊娜·戈夫瑞克 (Susanne Göpferich) 教授领衔设计翻译能力历时研究项目 TransComp，追踪研究了12名母语为德语的翻译本科生及10名有10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的译者。研究人员采用有声思维、按键记录、屏幕录像、短期回顾式

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耗时三年记录了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发展,提出了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见图1.3)。该模型包括六个翻译子能力:(1)双语/多语交际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双语能力,指掌握源语和目标语中的词汇、语法和语用知识的能力;(2)专业领域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语言外能力;(3)工具和研究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工具能力,指使用传统词典和电子翻译工具的能力;(4)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包括对某些特定语言对进行转换操作、生成可以接受的目标语言对的能力;(5)心理-运动能力,指译者阅读源语和生成译文过程中的动力,动力越强,所需的认知努力越少;(6)策略能力,与PACTE模型中的策略能力类似,可以控制其他子能力。上述六大能力都受制于三个因素:(1)翻译规范和翻译任务;(2)译者的自我观照和职业价值观;(3)译者的心理-物理倾向(Göpferich 2009: 21-23)。

与PACTE翻译能力模型相比,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涵盖的成分更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中间的车轮形部分,是翻译能力模型的主体部分;下方的三个矩形部分,既包括翻译规范等外围因素,也包括译者自身素质和能力;右上角部分,包括可用的外部信息、资源、工作环境等。另外,该模型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动机与策略能力同位于翻译能力的核心。整体而言,TransComp模型特别重视策略能力、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这三种能力是区分具有翻译能力与未经专门翻译训练的双语者的重要参数(Göpferich 2009: 30)。

从现有研究看,对比翻译学员、职业译者等不同类型译者翻译过程及其翻译产品的研究较多,但对比各个变量相互关系及探讨翻译能力历时变化的研究却相对较少。TransComp模型基于三年多跟踪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活动所需的能力,有助于拓展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启发很大。但该模型包含的成分较多,可能会陷入Pym(2003: 487)担忧的状况:多成分能力模型不缺少翻译是什么、如何教等方面的讨论,但哪个阶段需要哪些特殊指导和训练、教授多长时间等讨论却相对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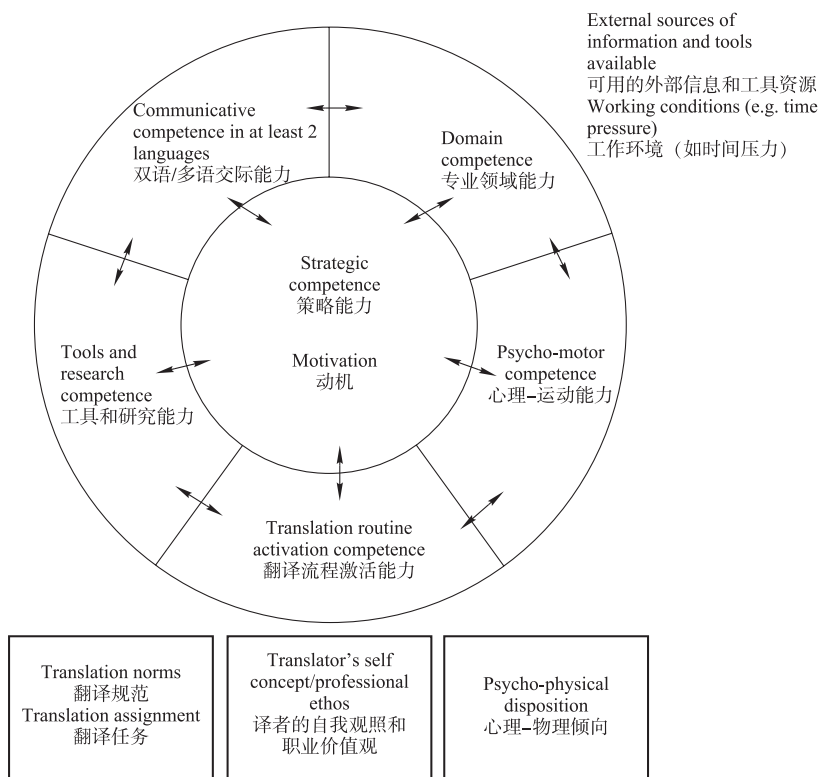


图 1.3 TransComp 翻译能力模型 ( Göpferich 2009: 21 )

### 1.2.2.3 初始和优化的 EMT 翻译能力框架

受欧盟“达芬奇项目”(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资助,自2004年10月1日起,欧盟委员会启动EMT课程,面向各成员国招标采购培养单位,培养高层次专业翻译人员。2009年,EMT专家组(EMT Expert Group 2009)发布了EMT翻译能力框架(见图1.4),规定了学员毕业时需要具备的翻译能力。该翻译能力框架由六个模块组成:翻译服务提供能力、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信息挖掘能力、技术能力和主题能力。翻译服务提供能力位于能力框架的中心。该翻译能力框架看上去像车

轮，通常称为EMT能力车轮（EMT Wheel of Competence）。该能力框架符合当时翻译市场变化、译者的职业化需求，尤其是翻译市场上技术变化的需求，成为欧盟开展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主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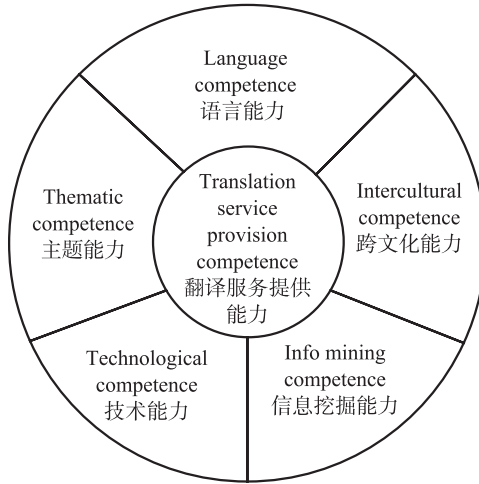


图 1.4 EMT 翻译能力框架 (EMT Expert Group 2009)<sup>1</sup>

尽管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且对翻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人类智慧、知识和技巧仍是保证翻译质量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时代，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译出翻译需求激增，挑战了传统的母语规则；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机器翻译和其他原先用于商业的翻译技术工具逐渐用来辅助人工翻译等。这些变化影响了翻译过程和翻译市场，也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 (EMT 2017)。顺应这些变化，EMT 专家组于 2017 年推出了修订后的翻译能力框架，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 (见图 1.5)。

<sup>1</sup> 该图与图 1.5 中 competence 一词为笔者补充，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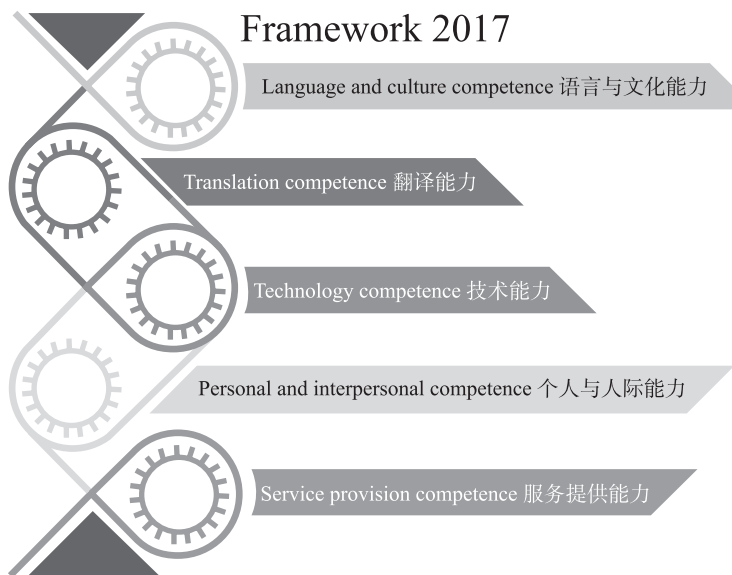


图 1.5 2017 版 EMT 翻译能力框架 ( EMT 2017 )

新版翻译能力框架由语言与文化能力、翻译能力、技术能力、个人与人际能力、服务提供能力五部分组成。五种能力似链条的齿轮，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共同推动译者提高翻译能力。该版框架突出了技术能力和个人与人际能力的重要性。技术能力除常规的翻译技术能力外，还特别包括了机器翻译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以及翻译技术的应用、研发和应变能力。个人与人际能力是软能力，有助于译者与市场有效接轨。具体包括：译者能够规划管理时间、压力、工作量；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任务；重视团队合作；善于使用社交软件；适应工作环境；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提升等 (EMT 2017)。

2017版翻译能力框架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将语言和跨文化能力合二为一，成为语言与文化能力；第二，将翻译能力作为独立的能



力，2009版中的主题能力纳入翻译能力范畴；第三，将信息挖掘能力和技术能力合并为技术能力，着重强调了基于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能力的重要性，体现了技术发展尤其是优化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对翻译的深远影响；第四，将翻译服务提供能力中的个人与人际能力独立出来，强调译者与客户或者同伴积极合作、积极利用各种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等合作完成翻译任务的能力。

### 1.3 国内关于翻译能力研究的探讨

国内翻译能力研究进展飞快，相关研究集中在国外翻译能力介绍和评述、翻译教学中的能力研究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详细介绍了国外翻译能力研究的最新成果，如PACTE模型(仝亚辉 2010)、TransComp翻译能力研究(王娟 2016)等，有助于学界及时了解国外翻译能力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为我国专业翻译人才尤其是翻译硕士培养提供参考。国内学者积极将翻译能力研究成果应用于英汉、汉英翻译教学(苗菊 2007)，或结合翻译教学实践进行理论探索。

从理论模式看，文军(2004)将翻译能力归纳为语言/文本能力、IT运用能力、策略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等多项分力。王树槐、王若维(2008)提出翻译能力的综合模式包括语言-语篇-语用能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思维能力和人格统协能力等。钱春花(2012)提出译者的翻译能力由内驱动力、知识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构成。张瑞娥(2012)重新建构了翻译能力，将其分为条件性翻译能力、本体性翻译能力、实践性翻译能力和评估性翻译能力。

从研究视角看，冯全功(2010)基于认知视角讨论了翻译能力的构成，包括翻译图式和认知机制，其中翻译图式涵盖风格、审美、文本、文化、语言、主题、工具、职业等；认知机制则涵盖直觉、知觉、意识等多

种信息加工、逻辑推理、策略运用机制。他还指出后天培养对认知能力提高有重要意义。认知资源的构成和质量有助于区分新手和专家译者；译者翻译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优化认知机制、整合认知资源等。刘晓峰、马会娟(2020)从社会学视域出发,提出译者应具有翻译领域的场域意识、规范意识、资本意识和惯习意识;懂得译者场域、译者规范、译者资本、译者惯习和译者能力的内在关系;了解国家政治、文化和外交身份建构与译者能力的内在关系,以及完成译本所需的各类能力要素。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掌握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如场域、规范、资本、惯习等,培养学生的社会建构意识,强化惯习,积累资本,为他们建构场域、走向职场奠定基础。

从培训内容看,李瑞林(2011)提出译者需要具备语言素养、知识素养、策略素养、数字素养、批判素养和社会素养。刘和平(2011)认为职业译者应具备双语能力、分析综合抉择能力、语篇处理能力和职业能力。杨晓华(2021)构建了专业文类翻译专长模型,由翻译专属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和自我概念五大方面构成。封一函、方之(2022)将自由译者职业能力分为市场能力、行业能力和自主能力等。

具体应用上,马会娟、管兴忠(2010)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笔译教学经验,将汉译英译者的翻译能力总结为五个主要方面:双语交际能力、翻译专业知识、策略能力、语言外能力以及查询资料的能力。李海军、李钢(2012)认为英语专业学生应具有双语能力、百科知识能力、翻译策略与技巧能力,以及翻译技术能力。陈朗、徐志萍(2019)将PACTE翻译能力模式对接MTI翻译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等。上述研究为我国蓬勃发展的翻译教学事业,尤其是本硕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提供了重要启发。

总之,翻译能力不等同于双语能力,它涉及译者为完成翻译工作必须充分调动的所有潜在知识和技能系统。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翻译市场的变化等,促使翻译能力构成要素不断发生变化,对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也推动了翻译能力研究的迅速发展。基于翻译教学、实证研究、翻译市场变化、技术发展等实际情况,研究者不断审视已有的翻译能力构成要素,进一步优化翻译能力模型,为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

## 1.4 翻译能力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翻译能力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翻译能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翻译能力的界定和描述。但是鉴于翻译能力的复杂性、异质性、开放性、创造性、特定性和历史性等特性(Neubert 2000: 4-5),翻译能力的探讨呈现出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特点。Piotrowska (2015: 13-15)指出,在多视角的翻译能力研究中,有四个视角特别值得关注:将翻译能力作为抽象概念进行研究的理论视角;在翻译过程中分析翻译能力的心理视角;将目标文本质量作为翻译能力评估(传统的翻译产品错误分析)的评估与应用视角;译者培训框架下考察翻译能力的教学视角。

翻译能力的理论视角将翻译能力作为抽象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例如Harris(1976: 96)持“自然翻译观”,认为所有双语者无需任何培训都能进行翻译。随着双语者语言水平的提升,其翻译能力也随之提升。Wilss(1982: 58)认为,翻译能力是建立在源语和目标语所有知识(包括文本-语用层面)之上的语际超能力,是在更高层面上整合两种单语能力的的能力。

Bell(1991)区分了基于产品的翻译和基于过程的翻译,将译者能力界定为译者从事翻译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并提出翻译过程模型。他认为,译者作为交际者所需的交际能力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得体地理解和产生话语的能力)、语篇能力(结合形式和意义实现口语

或书面文本的能力)和策略能力(提升交际或对交际失败的情况作出弥补的能力)。依据Bell的翻译过程模型,翻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的处理过程:句法处理、语义处理和语用处理;该模型主要关注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不涉及翻译产品的评价(Bell 1991: 61)。

翻译能力的评估和应用视角主要是指基于翻译文本的质量推断译者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评估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Nida & Taber (1969)提出读者反应理论,即成功的译文在其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类似原文在其读者中产生的效果。但是该理论因无法测量读者反应而受到质疑。Reiss(1971/2000)的文本分析模型将文本类型和语言层面对应,力图系统评估翻译文本。Hatim & Mason(1997: 170-171)借鉴Bachman(1990)的语言测试理论模型,将翻译能力划分为源语处理能力、目标语处理能力和转换能力三部分。Cao(1996)同样借鉴Bachman(1990)的语言测试理论模型,将翻译能力划分为语言能力、知识能力和策略能力。Nord(1991)则依据“目的论”(skopos theory)框架,提出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定应基于目标语文本功能的观点。按照目的论评价原则,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是判断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此外,了解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无论对于翻译学员还是职业译者都大有裨益。Nord(1991)指出,翻译教学应为学生提供翻译目的的详尽标准,以期实现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的功能,译文的形式也应符合目标语文化中该文本类型的规约。House(1997, 2015)以Halliday(1973)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采用功能语用模型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House的评价模型重视源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该模型将翻译分为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并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她指出,翻译评估应该区分文本分析和社会评价。文本分析指通过对比文本,描述和解释语言-文本分析中的差异,进而评估翻译质量。House提出翻译质量评估研究应重视文化过滤的范围和效度,关注语用对比分析。Bowker(2001)采用大量自然文本,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统计学的方法评价译文质量。Williams(2004:

336) 提出文本论证原则及其评估模式。Colina (2003) 提出功能-成分路径 (functional-componential approach), 即通过提高译文某些成分的比重或者优先考虑某些成分, 确定质量评价中应重视的方面。诚如House (2015) 所言, 每一种翻译质量评估模型都基于某种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的不同导致翻译质量评估存在差异。目前, 学界对翻译质量评估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色和趋势 (Angelelli 2012; Yan *et al.* 2018)。同时需要注意, 翻译能力评估也不应局限于理论层面, 而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以加深认识。

翻译能力教学视角下的理论研究聚焦教学环境下界定和发展的翻译能力。Campbell (1998) 指出, 翻译能力模型应该能够明确描述翻译能力发展途径, 并提出了译入第二语言的翻译能力模型。该模型包括文本能力 (textual competence)、倾向 (disposition)<sup>1</sup> 和监控能力 (monitoring competence)。PACTE模型的重点之一是教学环境下翻译能力的发展和评估。基于职业译者与外语教师的比较, PACTE团队提出翻译能力指译者具备的潜在的知识技能体系。翻译能力应包含译者完成翻译任务所需的多项子能力, 这些子能力之间相互关联。传统翻译教学是规定式的, 且是产品导向的。如果教师或培训人员能够理解学员的翻译过程, 则能更好地提升学员的翻译表现。翻译教学中如果采用过程教学法, 以学员为中心, 基于学员需求安排教学设计, 关注翻译教学过程中的同伴讨论、日记撰写、口头汇报以及问卷调查等, 重视教师和学员合作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效果将更佳 (Fox 2000)。基于翻译能力的翻译教学大纲应体现某个或多个翻译能力模型。如果翻译大纲能够深化学员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 将有助于成功传递专家知识和技能。

与多成分能力模型不同, Pym (2003) 的翻译能力最简方案将翻译能力定义为生成和选择译本的能力, 具体描述为译者具备生成系列对应源文

---

1 也有学者译为“意向能力”“禀性”。

本的目标文本的能力，以及从多个目标文本中快速且有足够理由地选择合适译本的能力。Pym对于工具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构成部分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工具能力是译者应具备的一种资格，资格随技术和社会需求而变化(Pym 2003: 482)，不能将译者需要具备的所有资格全都不加分辨地归入翻译能力；否则，翻译能力的定义将无限冗长。

作为翻译能力研究的一个工具，有声思维这一心理实验方法对于探讨翻译过程这个“黑匣子”至关重要。但该工具具有一定主观性。因此，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开始使用击键记录软件Translog，实时记录翻译过程中所有按键活动。到了21世纪，翻译过程开始引入眼动追踪技术，即通过眼动追踪软件自动记录被试眼睛聚焦屏幕上某一特定单词的位置。近年来，事件相关电位(ERP)、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PET)、功能性近红外扫描(fNIRS)、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等神经成像技术相继运用到翻译过程研究，主要记录翻译过程中被试的大脑活动。综合使用这些方法提高了翻译过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研究者(Hurtado Albir 2021: 389)提出的翻译过程研究还需要加强实证研究的问题。

翻译学与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协作使翻译过程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而翻译能力的研究就为其提供了重要突破口。鉴于翻译能力的复杂特性，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将有助于推动翻译能力研究向纵深发展。

## 1.5 小结

翻译能力及其研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其中PACTE、TransComp、EMT团队的研究非常深入，尤其是PACTE和EMT团队根据研究进展和翻译市场发展优化了翻译能力发展中所需的要素，对翻译教学很有启发。与基于有限被试研发的翻译能力模

型不同，EMT专家组根据市场需求与多年译者培训经验，提出了2009年和2017年两版EMT翻译能力框架，该框架对于我国日益蓬勃发展的翻译专业的教学和人才培养颇有启示。翻译教学要紧密切联系翻译市场和行业实际，教师和学习者都需要主动地调整对翻译能力的认识，积极培养市场需要的翻译能力。